责编:曹颖新 E-mail:wenshiban@hotmail.com Tel:010—62806236 2014年10月20日

文化视野

文化是千秋大业

□力 行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，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，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，关系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。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任务，并作为整个十八大报告的一个大的部分。这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，着眼于长远发展的一个战略方针。

搞好文化建设，首先我们要明白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？从中国语源历史上来讲，文化就是文物化成。顾名思义，就是把原始的事物经过人文的改造，使其内部和外部的条件及价值发生变化，从而成为一种新的东西。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信仰、一种行为规范、一种游戏规则、一种价值观。一个民族的最核心的精神气质，就是由以上方面所形成的文化决定的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，最核心、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中国人“威武不能屈，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”的高尚人格，就是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担当精神，就是“和为贵”“和而不同”的包容胸襟。这些文化气质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，熏神染骨，使每个中国人为之敬畏，为之振奋，为之自豪，并世世代代传承不息。这些东西才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之所在，才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魂脉之所系。在文化建设中，决不能把文化简单地只看成戏曲、音乐、电影、舞蹈。电影电视戏曲这些艺术形式，事实上只是传播文化的媒介。就是说，现在我们平时所称为文化的，只是传播文化的媒介，文化的实质并非媒介本身。我们在文化建设中，要防止舍本求末，而更应注重于更高层次的本质的东西，从信仰的角度，从价值观的角度来思考问题。这样才能够使文化起到引领风尚、教育人民、服务社会、推动发展的目的。

文化的建设和重塑是一项持久的社会系统工程，要遵循文化传承发展的规律。文化存在于人们生存的社会环境中，对人们的影响是一种润物无声、潜移默化的作用，文化熏陶事实上是一种人格的重塑，是一个由表及里再经里到表的过程。经历和环境对一个人的文化素养的形成有很重要的影响，这种影响并不单单是教育，更不单单是在学校，有时是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文化建设也并不是有钱就能解决问题，不是搞几个项目、几个产业就能把文化搞上去了，也不可能像经济建设那样用产值多少来衡量效果，并且立竿见影。往往是十年磨一剑。经典性的文化艺术作品并不是有了金钱就能打造出来，像《红楼梦》那样的杰作，恐怕给多少钱也并不见得就能写得出来。梵高一生作画无数，名作斐然，但却贫病交加，死后一百年其画才为人识。文化建设是千秋大业，必须要有耐心，必须舍得花时间来涵养，着眼未来，从孩子、从根本抓起，不能急功近利。否则弄不好会制造一堆文化垃圾，而且这种东西一旦形成，还不像清理豆腐渣工程那么简单，影响是很长远、深重的。

文化建设必须以继承和弘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，学习借鉴世界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。文化是民族的血脉，是人民的精神家园。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，有着很复杂的因素，是和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，是和一个民族生息繁衍的地理环境、风俗习惯相掺和，在民族兴衰成败、交流融合过程中长期积淀、选择、演化、变迁中形成的，是一个民族的血、汗和眼泪的结晶，它不可更改地打着这个民族的烙印，成为这个民族的象征。对于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来说，战争和国土的被征服不是真正的被征服，文化上的被征服才是真正的被征服，文化的灭绝才是最彻底的灭绝。从这种意义上来说，文化的覆盖面更宽广，文化的影响比政治更久远，比经济更深刻。中华民族历史上历经磨难，几千年来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，国家没有灭、民族没有散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传承从来没有中断过。人类历史上也曾出现过高度发达的其他文明和文化，例如古希腊、古罗马的文明，但都中断了，国家和民族也消亡了。就是因为在战乱中城市被毁灭后，城邦文化都在烈火中化为灰烬，文明也随之湮没。中华民族的根脉在民间、在乡村，有时候即使外族侵入，城市陷落甚至改朝换代，但文化和历史仍旧在瓦砾下、在碾痕上、在镰刀留下的根墩上、在烈火留下的灰烬中不屈地死而复生。正像一首诗描绘的：“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”所以在文化建设中，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，必须始终牢记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使命，这是我们文化建设的根本。讲文化自觉，这就是最大的自觉。只有有了这个文化自觉，才能树立文化自信。

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，并不意味着不加区别地全部将过去的东西保留下来。我们的传统文化不都是精华，甚至可能有很多东西是糟粕。一个民族，就如一个人，要发展、要进步，就必须向前看，开放而不能封闭。但我们的根本还是传统文化，这是不能选择的，就像一个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母亲一样，失去了传统，就失去了自我。从历史上来看，在几次大的文化交流融合中，凡是以传统文化为本，再学习借鉴外来文化的，都比较成功。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佛教传入中国。以儒释佛、以道释佛。事实上中国的佛教已不是原来意义上印度的佛教，但是它的传入丰富了中国文化，新的理念和意象大大开拓了中国人的思想，比如像今天仍在使用的一些语汇“觉悟”“境界”“理想”“气象”等，丰富了中国的语言文字。开始是一种词汇，但这种词汇会激发一个民族的文化想象力，思想就开阔了很多。但这是以中国文化为本的，以儒释佛、以道释佛，因而是比较成功的。事实上，佛教文化后来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。包括唐朝吸收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，也是比较成功的，这些都给古老的中国文化输入了新鲜血液，对中国文化的丰富和繁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所以，只有立足于传统文化，以民族文化为家园，吸收外来的文化，取长补短，为我所用，才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。

徐迟的时代使命感

□田珍颖

百年，作为生理生命的节点，不是人人能达到的；但，百年却可以是一个精神生命的节点——我们在这个特别的时段中，怀念我们所敬所爱的人，将他们的精神，延续一个百年又一个百年。这样的纪念，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有意义的传承。那些对人类有贡献的人物，将在这个传承中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

徐迟先生，以他不同凡响的使命感，而立于当代文学史中。他以自觉的使命感，为报告文学作家树立了一个时代的标高。

他说，“我和报告文学是有一段不解之缘的”；他认为，这不解之缘就是“报告文学要我报告我们时代的使命”；他肯定地说，“这是我们时代的使命”。

一个如此有使命感的作家，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？

翻开当代文学史，徐迟用作品树立了一座里程碑。

这个里程碑的建立，是由于他在一个特定的艰难时代，开拓了一块精神家园，这块土地曾经荒芜并被冻结，但徐迟先生挥动着蘸满激情的大笔，如刑天舞干戚般地开垦了这块荒地，在多年的磐石重压下的知识分子，终于在徐迟的笔下，显示了腰杆的挺直、精神的不灭和意志的不屈。

这是一场多么持久而又艰难的开垦，当《哥德巴赫猜想》大放光芒的时候，我们才来得及回头看到徐迟先生一路走来的深深的脚印。

其实，在《哥德巴赫猜想》中所闪现的思想光芒，最早在“左”的思潮兴盛的五十年代初，就已在徐迟先生的笔下萌生。他在当时文学作品大写工农兵的主流中，独树一帜地开笔写《火中的凤凰》，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是写文学家郑振铎的曲折一生，而且一写就是十年；同样，以画家常书鸿为典型的《祁连山下》，竟动笔于风雨欲来的1956年。

十年“文革”，十年沉默。之后，徐迟用《地质之光》等写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，为《哥德巴赫猜想》的问世，铺设了一条坚实的道路。《哥德巴赫猜想》是徐迟开拓知识分子题材的扛鼎之作，但徐迟又以后来的《在湍流的漩涡中》《生命之树常绿》等诸多名篇，将知识分子在文学走廊的形象排列成一个坚实的群体。

我们从宏观上应当明确地看到，徐迟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，它们的意义并不仅限于对报告文学题材的开拓，它更是一个作家，在时代使命感的担当下，对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认知失误的大纠正大反拨，对执政党政策偏差的大警示。对一个手无寸铁只有一杆笔的作家来说，这是怎样的胆识、怎样的良知和怎样沉重的使命感呀！

我们只有将徐迟知识分子题材开拓这件事，提高到文学之外的政治、社会的高度来认识，才能衡量出徐迟作品的力度。

当我们从徐迟先生的作品，感受到他内心激流的温度和力度时，当我们景仰地望着他用使命感为我们建造这座文学里程碑时，我们不禁还要追寻，他留下的这一篇篇精品，是以怎样一种韧性，精益求精地用心血的结晶创造出来的。

徐迟在说到自己的写作状态时说：一旦思考构思成熟，就没日没夜地写，“像演员一样，投入境界”；夜以继日地写，写得“不知时辰，不知今天是何月何时星期几”；甚至写得忘了吃饭，面包和水就可以成为写作的物质支撑。

而这种忘我的写作源泉又是来自他“寻找一杯生活的泉水”，他尝到了这种泉水，咏诵它的“甘洌”。于是，自五十年代开始，在三门峡、武汉长江大桥、第一汽车制造厂等热火朝天的工地上，都有徐迟的身影，他拥抱着生活，书写着现实，传递着时代的最强音。

和当下那些坐在电脑桌前，用鼠标代替行走的脚步，以网上抄袭资料而放弃了对社会现实调查的作家相比，徐迟先生显得是多么敦厚、扎实和勤劳不息啊。

但这样丰厚的生活基础，并不是徐迟动笔的开端，他的可贵更在于他对现实材料有着理性的知识分子的思考。他判断“文化大革命”像一台一台地演戏，是“中国的内战”；他批判那个颠倒是非的年代，是“迷信掩盖了科学，愚昧反倒戏弄起公理来”。他的种种超前的思维，来自于他勤奋的读书，长年的知识积累，广泛地对知识的涉猎。这种非一日之功的“操练”，才使得徐迟的作品，几乎篇篇是精品，并且特点各个相异。谁能说，《哥德巴赫猜想》在融入他读过华罗庚的数学思想的同时，没有他研究过的马克思《数学手稿》中那种生动形象叙述的影响呢？

功力的深厚，有时会成为包袱。但徐迟用精益求精，早早地抛弃了这个包袱。他告诫年轻的作者：千万不要求多，要少而精。他说，大诗人“好诗也只有几首”，“我有很多作品，虽然写出来了，这叫胚胎，还未成形”，他是把这些作品一改再改的。他认为改好了，就发表；而改不好的，他果断地“弃之”。他推崇画家徐悲鸿经常将不满意的画稿毁掉的严谨学风。他认为，大作家就要会“控制自己，只发好作品”。“控制”一词，就是徐迟的自律，他明白地宣告：“我就是这样严格控制自己的。”

今天，回忆徐迟先生的这些话，令人心潮难平。而时下一些人，拿着他们带着硬伤、框架稀松的作品，拿着他们筋骨乏力、思想苍白的作品，招摇于研讨会上，游走于评奖行列，力图在廉价的评论之簇拥下，金榜题名。对比之下，我们更加怀念的是徐迟先生那种远离功利的神圣写作态度。

想起徐迟先生在1990年春天病后的一件事。那时，他读到一位年轻友人的一首诗，其中有“去用清风写一首亮节的诗”的句子，徐迟先生反复吟咏这句诗，并说自己“要尽可能写出一篇篇的‘亮节’的诗”，说这样的诗，才“很有回味”，“很可寻味”。

这是徐迟先生的自勉，又何尝不是他对后来者的勉励呢？

倘若在我们纪念他百年诞辰的今天，能记住他的这种勉励，并将它播种在整个文坛，那才是对徐迟先生最好的纪念。

（本文是在中国作协纪念徐迟百年诞辰会上的谈话）

文化长廊

教育是一种信托

□车 耳

金融领域的信托往往是管理和募集资金，教育领域的信托则是管理和募集知识和技能。从信托四个主要特性上讲，学校教育就是一种信托，就是连接各方的信托关系。在这种关系中，人与人之间的权利边界被划定，责任和义务也得到了重构。

权利义务是有界定的

接受教育权利也是与生俱来的。幼童成长过程中首先要像动物一样会吃会睡会生长，而父母则天生具有教育子女的义务，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父母。

孩子长大成人后要进入社会就需要了解其规则，而这些规则绝大部分是社会教育而非父母教育才能获得的。于是教育的权利就分成了三种：教育权利、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实施教育的权利。简言之就是：教权、受教权和施教权。

孩提时这种权利区分还不明显，因为它只涉及父母和孩子两方。当孩子被送到幼儿园或者寄宿学校时，这种教育权利就被重新界定。这时候委托人就是父母，受托人就是幼儿园或者学校，受益人则是孩子。在规定期限中，也就是上学期间，三方的教权和责任被自然划定：首先，委托人将资金委托给学校，可能得为此支付一笔可观的费用，还要保证按时缴费，并配合学校安排作息时间；其次，受托人则会在规定期限内尽量达到预期目标，比如在六年内完成所有小学课本的教授；最后，受益人身心得到计划中的成长，当然这是在遵守学校规定的前提下。

在一个现代国家，受教权既包含了每个公民均有上学接受教育的权利，也包含了国家义务方面，就是提供教育设施，培养教师，为公民受教育创造必要机会和物质条件。而施教权也包含了施教义务的，就是说无论父母还是乡邻，国家或者社会机构抑或企业，均负有教育责任。

管理应该是独立的

幼儿园、托儿所和学校都是一种形式的教育信托，他们都具有独立性，独立于家庭教育，独立于社会风气。在这里学生被教导要听老师的话，老师的话往往高于家长的话，更受孩子们的重视。老师的权威往往高于家长的权威，因为与家长相比，老师说的是公众语言，阐述的是普遍性道理。

教育理念应该是独立的，家长应牺牲置喙权，不能干预学校教程。因为每个家长都要求置喙权的话，教育关系就会混乱，教权一乱，施教权也就无法实行，受教权就会受到侵害，受教人利益就会受到伤害。

教育管理也应该是独立的。应该强调的是社会教育，家长在这种关系中好像是个课外辅导员的角色，主要课程则应该是由学校设计。施教者应该是以育人育德为目的，使受教者身体健康品性良好学业有成，而不仅仅是长大成人。按先哲的话说：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

责任应该是有限的

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，是学校的当然之责，在这一点上学校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要承担所有教育学生的职能，也不意味着学校要向失败的案例负全部责任，尤其是法律上的责任。因为教育不是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，学校教育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般神奇。无论内在素质教育，还是外在技能培训，或是培养社会责任，必须承认学校教育的作用是有限的，所以其承担的责任也应该是有限的。

毕竟，学校影响力的范围是有限的，只能管在校时间，这连一半甚至三分之一时间都不到，而学生大部分时间还是处在家庭和社会影响下；学校影响力的内在因素也是有限的，教程的设计是面对所有人的，但是每个人接受的效果是不一样的。

关系应该是连续的

即便教育不能解决所有问题，其关系也应该是连续的。

家庭教育关系是连续的。长大成人前，大部分人几乎2/3时间生活在家庭之中，朝夕都在接受着家长的教育。这种教育往往是在有意和无意之间、有计划和无计划之间、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完成的，父母是终身教师。这种终身性的教育往往反映了一个家庭风气，家风的好坏往往要延续几代人，甚至于十几代、几十代。家风是家庭教育关系连续性的一个重要体现。

社会教育也是连续的，家有家风，校有校风。比如伊顿中学毕业生都有衣着整洁遵守纪律的习惯，哈佛大学毕业的都崇尚独立思考和创新精神。有的学校还有校训，就像风气良好的家庭有家训一样，比如旧日上海女校将“优雅”二字写在校训上。

实际生活中，继续教育在西方国家早已流行。比如法国在拿破仑时代就创办了职业学校，以后他们逐渐展开大规模的继续教育，比如巴黎的技术和职业学院，任何人都可以申请，学习费用低廉，为那些曾经上不了大学或者想与时俱进的青年、中年甚至老年人提供了继续深造的机会。

教育可以是一种自主行为，也可以是一种信托行为。教育可以是单一的，也可以是综合的；可以是短期的，也可以是长期的。总之教育是多样化的，而人的一生也都在接受教育和实施教育，其中大多数都存在着信托关系。

教育问题谈

随想录

文明的支架

——流动的序曲

□杨仁明

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，有一种世界文明史上难得一见且独一无二的现象：一个王朝就有一种文化记忆，或称为文化符号。先秦散文、汉赋、六朝骈文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。以此来构建一种文化脉络，来伸展一种文明姿态。那些古典，仿佛是盛放在中华文明殿堂高庙的圣经，永远被无限的来者膜拜和景仰。

从蒙昧走向文明、从封闭走向开放、从自然走向人文，便有了先秦的辉煌。那些游走的灵魂，自由而奔放，大气而汪洋。老子、孔子、墨子、韩非子、孟子、荀子、孙子等等，罕见地拥有了那个岁月的天空。不管谁是谁非，只管尽情无束酣畅淋漓地表达。那是人类历史中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。他们，用一样简单而透明的散文体裁，承载了不同的灵魂表达和思想认知。

当多元文化的空气被短暂的、焚书坑儒的大秦帝国横扫，被大汉王朝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的集权政治归并之后，先秦的思想灵光逐步暗淡。政论出现了，汉赋出现了，它虽然流畅于文字的华美，洋洋洒洒铺成，浩浩荡荡流灌，但思想的触角已经禁锢，智慧之光渐渐零落。汉赋，便成为一种文学体裁。贾谊、晁错、董仲舒、司马迁等政论家的智慧，点缀了那个时代。先秦的人们在寻道的路上爬涉了千年，完成了一次与自然对话的艰苦历程。汉朝的人们则实践了“化道为术”的重大转折，借道还术，将那些被糅合了的思想融化于治国理政之中。只有胆大妄为的司马迁，在疼痛与屈辱中，以文化人的血泪为后世缔造了一座座山脉，从此，再没有人可以比肩、可以翻越，因为那是一部被人类自己认可和接受的历史。

在战乱与抗争中，在融合与分裂中，在出世与隐忍中，那些怀才不遇、大志难抒的文化人，挣扎于王朝与自我，彷徨于梦想与现实，开始选择进与退，斟酌有为与不为。于是就有了“建安七子”和“竹林七贤”，前者思进，后者思隐。吟诗作赋，对仗比学。骈文，便应运而生，成为了阳春白雪。华丽、铺张、工整、对仗、押韵、生涩等，在反复的酝酿中，形成气候。最终，同那些琳琅的佛堂雕塑一起，成为六朝底蕴中厚重的源脉。

走近了大隋，一统江山之时，注定天地翻覆。科举，让读书人看到了亮光。王者的非凡气度连同荒淫与暴戾，很快消逝在风云际会之中。然而，却酝酿了一个神话——一个文化现象即将应运而生。唐都，屹立在八百里秦川之上，以汇聚东南西北的磅礴襟怀，让读书人，席卷而来。蜕去六朝的浮华虚美，文化人渴望一种心灵的真实，渴望完成淋漓尽致的本真书写。那一声“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”的感慨，洞开了一个时代的门扉。之后，便看见了“初唐四杰”的卓然而立。从此，在大唐的天底下，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奔涌，始料未及的诗歌雷霆，从边陲到都市，从平民到达官，开始了一次铺卷河山的诗歌接力，诗仙、诗圣、诗鬼、诗豪，名家辈出，大师林立。那是一个被诗歌覆盖了的王朝，也是一个被诗歌搅动和定格了的盛世。

宋朝，是踩着五代十国的废墟走过来的，当陈桥驿上演兵变的时候，就诞生了“扬文抑武”的治国方略。于是，上至皇族，下至寒门，吟诗作画，歌舞升平。在悲与喜、忧与乐中，文人的意气被无限张扬和烘托，垒砌了中国文化姹紫嫣红、百花齐艳的高峰。于是，那些读书人，不再局限于古文运动中的散文、辞赋，借着唐诗的余脉，缔造了词坛。这是一块圣地，是一幅画卷，呈现了峰峦竞秀、鸿篇耀宇的壮阔，催生了泪悲古今、气吞山河的豪迈。范仲淹、苏东坡、辛弃疾、王安石、柳永、周邦彦、陆游、李清照等等，都是主角。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，在那个时代，似乎成了人们生活中无法褪去的色调。但是，光彩绚丽孕育的不仅仅是文明风姿，更多的却是王朝的安危。这是王朝覆灭悲剧的真正根脉，那一句“还我河山”的呐喊，透着无限悲壮和苍凉。

当蒙古人的金戈铁马如风卷残云，横扫中原之后，大元帝国的气象无法以诗词来承载。儒雅的诗词和散文，注定要被野蛮无情碾碎。在刀光剑影之中，诗词的根系是如此脆弱，甚至不堪一击。文化人的文明梦想被血腥地切割，那种信仰和底气被彻底动摇。然而，文明的力量虽然零散，但是长存。于是，文化便开始另辟蹊径，从高堂庙宇跌进世俗，去开垦另一片适合生长的土壤，元曲出现了。书写和说唱，被紧紧缠绕在一起，角色众多，表达更实，让阳春白雪联姻了下里巴人。

铁马金戈只是一种过程，而不是人们向往和追求的生命常态和终极意境。毕竟，文明与野蛮，自古势不两立。元朝，来得快，去得急，相对于漫长的历史，它就似一阵风来又一阵风而去，只是把伤痛永远留在历史的底层，时不时地泛滥出来，刺痛来者的神经。在元曲的咿咿呀呀声中，人们在嬉笑怒骂之后，越来越理性地思考社会和国家，也越来越懂得选择与塑造。那些文化人，在沉思和反省：人，究竟需要什么？这个问题需要回答，需要探究。于是，系统地融入和把握社会，并恰到好处地表达思考的结果。诗词，太过简单；散文、辞赋，未免深奥；元曲小调，又嫌小气。于是，便有了小说。读得让人荡气回肠，仿佛身在其中。个中人物，是己非己，已经模糊。但曹雪芹，塑造了一座凄艳绝世的丰碑。

走到了今天，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。

走过几千年的风雨，文化的肢体在残损中渐趋饱满，在阵痛中得以涅槃。哪怕这种饱满刻录着沧桑，这种涅槃滴尽了鲜血。借着沧桑的筋脉，迎着鲜血的足迹，让我们去感知无可替代、无可跨域的遥远，仿佛在寻找一种印证。

一种记忆就是一种印证，让后来人品尝——不论悲沉还是舒展，不论萧疏还是昂扬。它帮助我们，去回访曾经的时空，那些状态，那些场景，那些人物。

也许，那就是文明的支架。